

新茅卷

千山外，水长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 SHAN WAI SHUI CHANG LIU

馆

聂 华 苓

千山外，水长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戴 卫

插图：戴 卫

扉页题字：何应辉

千山外，水长流

聂华苓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76插页11 字数322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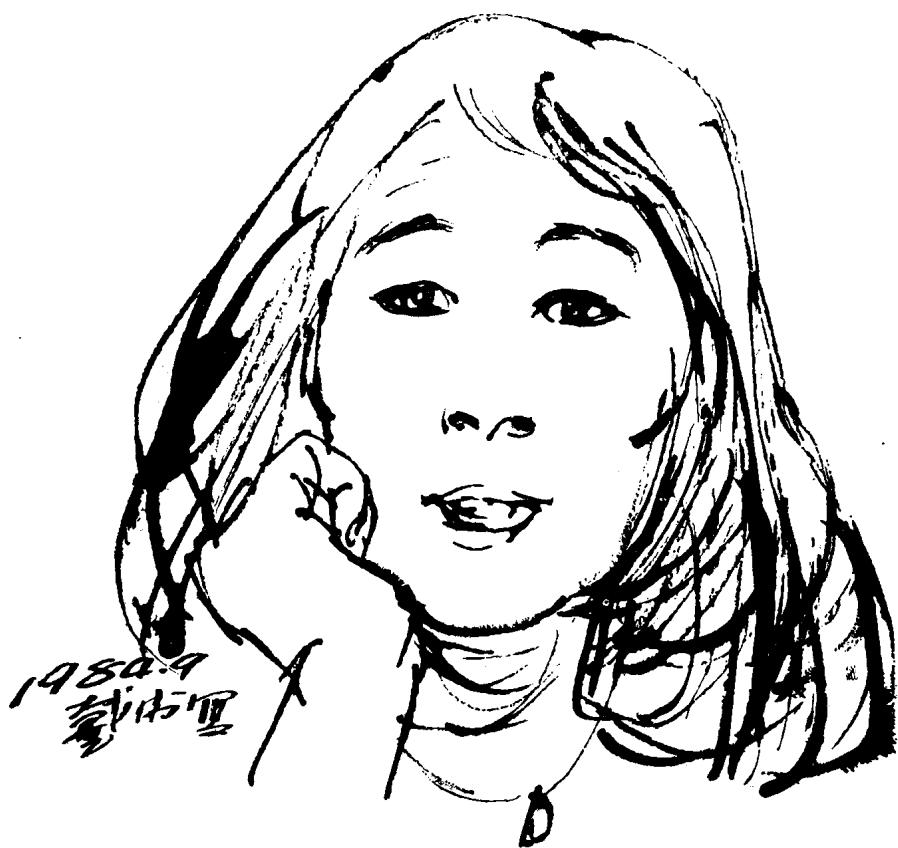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3,500册(内精装3,500册)

书号：10118·914

(平装)定价：2.15 元



作者画像

献 给

保罗·安格尔——我的丈夫

目 次

第一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月·美国石头城	1
1.	莲儿到达白云石山庄	3
2.	年轻的爸爸，你在哪儿？	40
3.	多少事欲说还休	74
4.	娥普西河上	90
第二部	柳风莲的一束信——一九八二年的回想 (一九四四——一九四九) 附带莲儿眉批	139
第三部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月·美国爱荷华城、石头城	313
1.	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315
2.	只不过是摇摇滚滚	340
3.	莲儿回头一笑	361
4.	太阳神庙的雕刻	380
5.	莲儿的矛盾	393
6.	濛濛、濛濛的露 ——失去的乐园	419
7.	听黄鹂鸟叫	444

第 一 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月·美国石头城



1. 莲儿到达白云石山庄

“不赞成！不赞成！我还是不赞成！”老玛丽在起居间的钢琴上弹着赞美诗《我们将在河边相聚吗》，皱巴巴的手突然停住了，搭在泛黄的钢琴键盘上，右手食指戴着一只厚实的、圆滚滚的纯金戒指。

老布郎没有答腔。他坐在轮椅里望着大雨洗刷后青青的草地。背后墙上挂着胡佛总统一张大像；他正好坐在那张像下面——那是他常坐的地方。从那儿可以望着窗外春去秋来、变幻不定的石头城景色：圆圆的山丘，圆圆的山谷，柔和得象“温柔的九月”妻子的身子。他对面墙上挂着格兰·伍德的名画：《美国的哥特风格》——一男一女，清教徒似的小市民，两人全是长长严峻的脸，紧闭坚毅的嘴，僵硬的身子，瞪着两眼。男人额头出奇的高，只因他头顶秃光了，穿着无领汗衫，工字裤，黑色外罩上衣，小小的圆眼镜，架在直挺的鼻梁上，拄着一根特大的三头叉——十九世纪的勇猛庄稼人用来叉稻草、打野兽的那种叉子。女人平板板的头发，界限分明地从中分开，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托出她两头尖削的橄榄脸。她穿着小白领黑衣，胸口别一只椭圆形象牙雕刻别针，小得几乎看不见，碎花围裙领上镶着一道细齿的窄花边。那一男一女并排端端正正站在一幢美国垦荒时代的小木屋前面；小木屋正面是一条条界限分明的木板，顶上突出尖尖的中古时代哥特式屋顶，正在那一男一女两张尖削的脸之间。从女人肩上望过去，可以看到小屋走廊角上摆了一盆

蛇根木和一盆秋海棠——经过严冬仍然生机盎然的花木，必定是那女人精心精意培养的。

《美国的哥特风格》是布郎家三代人引以为荣的名画。画家就是爱荷华州人。老布郎夸那张画描出了美国垦荒时代的精神面貌：虔诚，坚韧，正直，不屈不挠，信仰上帝。老玛丽呢？很少同意老伴儿的意见，但对于《美国的哥特风格》，她完全同意老伴儿的评语，甚至说它画出了往昔的美好时光。儿子彼尔二次大战后从中国回到石头城，望着那张画说：“这简直就是美国嘛！是最好的反法西斯广告！苦难的人民，心地善良，有稜有角，带着点儿幽默，还有点儿‘别惹我’的神情。”女儿兰熙笑着说：“就是这两张山羊脸叫我害怕！我非离开石头城不可！”兰熙的儿子彼利认为，《美国的哥特风格》就是对美国社会的讽刺：保守，顽固，自大到狂热的程度。

“嗨，玛丽。嗨，布郎。”彼利从屋外走进来，声音低低的，没有半点儿情绪。

石头城的人全叫他布郎，连他外孙也叫他布郎。布郎本是他家的姓，是石头城的石矿世家，现在没落了，石头城成了人烟稀少的“鬼城”。布郎在人们心目中，就是石头城美好时光的最后一个遗民。

“你们好吗？”彼利加了一句。

“你们好吗？”老布郎笑了一下，中风歪了嘴，透着点儿自嘲的味道。“我亲爱的彼利呀，人老了，可别问他好不好，只问他是不是更糟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吗？”

“老糊涂！”老玛丽叫了起来，“记性越来越不行了。今天是你儿子那个——”她突然停住了。

“今天莲儿要到了。”彼利淡淡地说，“你不是要我去

接她吗？我的车子又破又小，行李装不下。可不可以借一下你们的旅行车？”

“我再重复一遍，”老玛丽重重地说，“不赞成，不赞成，我还是不赞成！”

“你不赞成什么？玛丽。”彼利说，“不赞成我借车吗？”

“我知道，”老布郎开口了，“她不赞成彼尔在中国的女儿到石头城来。”他顿了顿又说，“说实话，我也没把握。我就怕，骑在背上的猴子，摆也摆不掉了。但是……”

“对不起，爹，”*老玛丽打断了老伴儿的话，“你能肯定那个中国女人就是你儿子的女儿吗？凭什么证据？儿子在中国死了三十几年了，从没听说他结过婚，更没听说他有孩子！现在，突然钻出一个中国女人，叫你奶奶呀，爷爷呀！太荒谬了！一年多以前，我们突然收到一个叫莲儿的中国女人的信。我回了信，说：‘对不起，你弄错了！我们的儿子也叫彼尔，但他从没结过婚，在中国也没有私生子。’她又来了信，仍然是奶奶呀，爷爷呀，仍然说她是我们儿子的女儿。她秋季进爱荷华大学，读中美比较文学，免学费，要我们做经济保证人，还要提早来看我们。谁知道她是什么人？我要她寄张彼尔的照片来，或者是彼尔的任何遗物——我们也要保证呀，保证她是彼尔的女儿。非常公平合理！她说：没有彼尔的照片，至于遗物呢，来时带来。她到了爱荷华，决不负累我们，决不取分文，只是要封公证的保证信就行了。我干脆不理她了。老头儿却回信，要她来……”

“算了吧！妈。”*老布郎坐在轮椅里无力地挥挥手，

* 老布郎、老玛丽夫妇互以“爹”、“妈”相称，表示夫妻间格外的友爱与亲昵。近年来，这种称谓在美国老年人中较为普遍。

——编者注

“别抱怨！人都快到了。这是我有生之年做的唯一一件冒险的事。我是个老兵，彼利，你外公是个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我还有老兵的精神：不怕冒险，死而后已。莲儿到石头城来，对于我来说，也是件冒险的事。我不象玛丽那么否定，但也感到很大的心理负担：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制度——共产党制度下生长的人，同我们谈得拢吗？彼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呀！”

“很对！”老玛丽连忙回应。

彼利耸耸肩，撇撇嘴，没有说话。

“信不信由你，彼利。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石头城，爱我的家。多么肥沃的黑黑的泥土啊！我坐在这轮椅里，闻着黑色泥土香，就觉得安全了。现在的年轻人呀！彼利，对不起，我得告诉你实话：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家，不要责任，忘根忘祖。我，我，我，‘我’的一代！美国这个国家走下坡路啦！”老布郎转头看看墙上挂得四平八稳的胡佛总统像：“那个时代不会回来啦！”

彼利坐在沙发上，两手无可奈何地一摊，仿佛表示：说也说不清，也就不说了。

老玛丽坐在钢琴旁边，怔怔望着钢琴台上半世纪前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年轻的玛丽穿着高领束腰长袍，年青的布郎一身黑西装、细格子衬衫、黑领结，背心纽扣吊着金表牌，两人端端正正并排坐在一张鸳鸯木椅上。玛丽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兰熙，布郎抱着两岁的彼尔。彼尔胖嘟嘟的，头发搭在额前，两手摊开，仿佛迎接什么：迎接未来？迎接世界？只因他两眼炯炯有神，张着嘴笑，更衬出眼前的彼利摊开两手的无奈神情。

老玛丽望着全家福的照片幽幽地说：“这些年来，我好不容易把彼尔慢慢忘记了，现在又想他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尔的死，至今三十多年还搞不清楚。彼尔是一九四九年在南京学生运动的混乱中给人打死的。爱荷华州议员要求国务院作彻底调查，还没开始调查，共产党就占领南京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人，都成了国家的英雄，只有彼尔，在中国内战中糊里糊涂死了。不管是谁打死的，总是中国人打死的！要不是那个中国女人引诱他，他也不会死在中国！”

“玛丽，”彼利笑了，“你怎么知道是中国女人引诱你儿子？彼尔告诉过你吗？”

“还用得着彼尔告诉我吗，中国女人，日本女人，韩国女人，越南女人，全是那么一回事！彼尔即使在中国有个女儿，也是个私生子！”

“私生子有什么错？”彼利说，“‘妈呀，妈呀，我的爸爸在哪儿呀？爸爸到白宫去呐——哈，哈，哈！’堂堂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就有私生子。”

“对，我记起来了。”老布郎说，“那就是克利夫兰竞选总统时候反对派唱的歌。”

老玛丽走进卧房，拿出一张莲儿的照片，递给彼利，“彼利，你看看，她是白皮肤？还是黄皮肤？这种黑白照片看不出肤色，中国连彩色照片也没有！”

“我不管他是什么肤色，玛丽。”彼利拿着莲儿的照片端详了一会儿，“她不象美国人，也不象中国人……”

“我也这么说！”玛丽的劲儿上来了，“爹，你听见了吧，彼利也说她长得怪！……”

“啊哈，玛丽！”彼利打断她的话，“我并没说她长得

怪！我要说的是，她相貌很特别：她的脸比美国姑娘细致、柔和；鼻子比中国姑娘挺一些，眼睛大一些。玛丽，你瞧这鼻子，翘翘的鼻尖，有点儿挑衅调皮的味。布郎家的鼻子——也是我的鼻子，布郎家遗传给我的唯一标记。我敢说，她就是布郎家的中国姑娘！”

“实在滑稽！”老玛丽不服气，“布郎家的中国姑娘！”

“对不对，妈？”老头儿声音响亮起来了，“彼利和我的看法一样！几代人全有我布郎的鼻子！彼尔的鼻子就是我传给他的！”他得意地呵呵笑了，仿佛彼尔就在眼前。老头儿一把白色连鬓胡子快乐地闪动。

“但是，头发的颜色呢？眼睛的颜色呢？爹！”老玛丽说。“我们的儿子有一头很好看的金头发，很淡很淡的金色，软得象丝。他的眼睛呢，是很淡很淡的蓝。这个中国姑娘，你们瞧，你们瞧！黑白照片可把她头发、眼睛的颜色照出来了：黑色！”

“黑得真好看！玛丽，”彼利无可奈何地对她摇摇头，“你是彼尔的妈妈，对不对？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现在，”玛丽用手摸摸头，“当然是灰色啦。”

“以前也不是金色呀！”老头儿歪着嘴笑望着老伴儿，透着点儿挑衅调皮的神情，“这个我可是很清楚。我和你同床共枕大半个世纪啦！”老头儿又呵呵笑了，“你的头发是棕色，发亮的棕色。你的眼睛也是棕色，很诚实、很温暖的一双眼睛。我就是看上你那双眼睛才娶你！”

老玛丽这回可笑了，眼睛笑成了三角形，肚子笑得颤巍巍的，一双点点黑斑鸡皮的手搭在肚子上，“爹，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你不给我机会告诉你嘛！”老头儿认真起来了，“你一天到晚，啰啰嗦嗦，唠叨不停，哪有我讲话的机会？我只有一天到晚看电视……”

“彼利，你听！”老玛丽指点着丈夫，“这老头儿，一天到晚抱怨！说我不管他啦！说我做菜不好吃呀！说我半夜起来看电视吵得他睡不着呀！我也睡不着，不看电视，干什么？”老玛越说越火，“现在好啦！家里来了个中国姑娘，我可不能认她做孙女！我的儿子就是中国人杀死的！还不是为了那个中国女人！”

“妈，”老布郎低沉地叫了一声，“说话要讲道理。彼尔是在中国死的，不错。一九四四年，他到中国去，是为了打中美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一九四七年，他到中国去，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要报道、研究中国学生运动。我不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女人才到中国去。”

“共产党占了大半个中国，他还不肯回来！兵荒马乱，谁愿意待在那儿？还不是为了那个酒吧女？”

“玛丽！”彼利有些激动了，“你怎么知道她是酒吧女？”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酒吧女？”老玛丽反问彼利，拿起桌上的报纸向彼利抖动着，“你看！你看！仅仅越南，就有两万五千‘杂种’呀！她们的妈妈不知到哪儿去了，全要到美国来！中国，日本，南韩，越南，多少混血儿要到美国来了，美国这一片干净土要变‘黄’了呀！”

“我倒是感到很歉疚，”彼利说，“美国人在亚洲欠下的孽债！我们对那些孩子应该负责的。”

“但是，”老玛丽指着报纸上的越南混血儿照片。“你看，这些越南孤儿已经到了美国。我们在还债呀！每个孩子

胸前挂着美国父亲的照片，这就是证据呀！那个叫莲儿的，她有什么证据？”玛丽顿了一下，“爹，你为我想想，自从你中风以后，我没过一天好日子，压力大，又害怕，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玛丽泪汪汪地哭诉，“我不能再有任何精神负担了。家里突然闯进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陌生的中国人！我实在受不了……”

“妈，”老头儿望着流泪的老妻，声音柔和了。“别难受，我是个老兵，死不了。只要你和我一起撑下去，我就死不了。也许是人老了，瘫了，常常想到过去的日子。彼尔死了三十几年了，我差不多忘记了。奇怪，最近我常常想起他，甚至于梦见他——穿着足球装，笑咪咪跑到我面前，叫一声‘嗨，爹！’我想的全是彼尔小时候的事。他进了大学以后，尤其是他去中国以后，我对他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儿子呀！妈，莲儿就是一条线，把我们和儿子搭上了。你明白吗？妈！就为这个，我才决定要莲儿来，才冒险为她作经济保证人。”

“爹，我也想我的儿子呀！我还想到他的骨灰回到石头城的情景。”老玛丽哽咽着说，“我可是一天也没忘记过他！兰熙，我放弃了，她在纽约有她的事业，她的生活，早已不属于石头城了。彼尔可不同，他有很强烈的家庭观念。假若他没去中国，他就不会死，说不定现在和露西正住在那儿呢？”玛丽指着一大片草原那边的一幢红色木屋，屋子旁边有一座灰色玉米仓。一架多年不转的风车竖立在蓝天下。玛丽朝那儿呆呆望了一会儿，眼泪流了一脸，“爹，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每个星期六上午，我必到布郎山庄后面的墓园去看看彼尔……”

“妈，我知道。”老布郎柔声说道，“妈，你去看彼尔，

我知道，我只是不向你提彼尔罢了。”他顿了一顿，“妈，我让莲儿到石头城来，假如是个错误，也是我断气之前最后一次错误了。”

“玛丽，”彼利微带感动的声音，“莲儿就要到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且看莲儿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就住在水塔里，”他一只手指向草原上的石头水塔，“这么近！我可以帮忙解决莲儿的问题。现在是五月，她好，住下来，开学时候，到爱荷华城去；不好，你随时可以请她出门，自谋生活。现在，”彼利抬头看墙上的猫头鹰挂钟，“我们得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有半个钟头，莲儿的飞机就要到了。玛丽，我可以借你们的旅行车到机场去接她吗？”

“你爱开就开吧！反正车子是闲着的，我们早已不开车了。”

石头城在太古洪荒时代本是汪洋大海。海水退去，留下一片开采不尽的白云石矿和一条流不尽的娥普西河。从印第安人时代一直到现在，镇上的人都认为那是石头城的两大宝。石头城历尽兴衰，石头城的人历尽沧桑，但一垛一垛的山岩，白云似地没有飘走；娥普西河——一条清冽冽的柔水，仍然静静地流。“我们来了，去了，只有石头城和娥普西河永远在这儿，永远在这儿。”当年石头城开矿致富的“三大巨头”之一——布朗先生就自豪地说过这几句话。布朗先生是布郎的爷爷，那时候，镇上的人全叫他“布郎先生”。

布郎先生和另外两个家族，十九世纪后期被丰富的石矿引诱到石头城来。他们全是爱尔兰的移民。初来时，他们做